

警惕日本新军国主义者对台湾的阴谋

李恩涵

自第二次中日战争(1931—1937—1945)日本败降后,至今已整整60年,另外自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也已32年了,但日本在战争责任问题上虽然官方承诺要“深刻反省”,但其朝野之主流势力一直是含混其辞,甚至悍然否认或半否认其战争责任,而且每过一段时间就有日本内阁的高官首长,发表诡词谬说,公开否认或半否认日本战时在华的某些证据确凿的罪行与暴行。自1985年后甚至有许多位首相每年前往参拜日本对外侵略象征(供有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侵华最高A级战犯、其罪行滔天为我中华民族断难予以宽恕的14人及自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侵略中国阵亡官兵)的靖国神社;其地方官僚(如东京都知事、市长石原慎太郎之流)与在野人士自80年代之后所发出的扭曲史实、拒绝面对史实的种种谬论与恶劣行径,更是不胜枚举。^①种种迹象都显示,日本主流社会对于中日两大民族之永久性和平共处之远景,实际并无诚意,其主流人士中的某一些人(包括日本新军国主义者与一些充满民粹思想者)的内心深处,实充满着20年代德国纳粹党人复仇主义者的深沉心态^②;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所应面对及予以严肃对付的。但

① 李恩涵:《日本军战争暴行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12页,254—266页;冯昭奎:《对话:北京和东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② 李恩涵:前引书,页254—255。实际美国学者对于日本社会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所兴起的复仇主义思想,也是密切关注的;见 Laura Hein & Mark Selden eds. *Living with the Bomb: American and Japanese Cultural Conflicts in the Nuclear Age* (N. Y. : M. E. Sharpe, 1997), pp. 59—71.

日本的新军国主义者在其卑劣的“崇拜强者”的原型武士道思想的考量下,不敢向当年向他们掷了两颗原子弹、至今仍为全球唯一超强在军事上牢牢控制着日本的美国,声言报复(惟日本右翼首领之一的石原慎太郎曾于 80 年代末期当美国经济陷于低潮之时,曾公开倡言要向美国报复),却于 1996 年 4 月日美首脑会议中发表《联合安全保障宣言》,重新确认了美日同盟的性质与平等性规范,在对外大战略上突然作了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对美国人仆匍膜拜在地,想在美国的核子伞与卵翼之下,做出要与中国直接对抗的日美合作战略(换言之,即将冷战时期的日美同盟合作对抗苏联,改而为日美同盟合作对抗中国)——这就是 1997 年 9 月 23 日日美协议修订原于 1978 年签订之“美日防务合作指针”(指所谓“新指针”)之最重要的背景与意义。所以,当 1998 年 11 月江泽民先生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20 周年而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时,日本首相小渊惠三不只拒绝就中日历史问题如他本人曾对日本侵略韩国一样,表示“深沉懊悔与道歉”,而且也拒绝就台湾问题如美国总统克林顿一样,表示“三不”,从而使中日之间的三座大山,即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与钓鱼台主权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或不够明晰,形成近年两国问题“政冷经热”的基本局面(“经热”可以自近 10 多年来中日贸易总额的增加看出来:1991 年的贸易总额尚只 200 多亿美元,1993 年则超过 360 亿美元,1996 年突破 600 亿美元,1998 年虽降为 579 亿美元,2000 年则升至 875 亿美元,2002 年达 1019 亿美元)。^①

不过,种种事实与迹象都显示得非常清楚,当前中日之间“政

① 《中国时报》(台北),1998 年 11 月 27 日;1998 年 11 月 28 日;1998 年 11 月 29 日;张海鹏:《试论当代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见《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1 期,第 1—24 页;《世界日报》(Los Angeles),2001 年 2 月 9 日。

冷经热”的现况,实际是一种假象:日本虽然口称“不支持台独”,表面上对华实行奸诈的、言行不一的低姿势,实际却在强化(有时系用1933年前德国式的“掩饰性强化”)其传统军力(包括掩饰性核武)的基础上,假手于日本在野与地方政府中的新军国主义者如中岛岭雄、石原慎太郎之流以及其他不甚出名但却能发生相当作用人士之出面,利用台湾海峡两岸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穿梭于日本与台湾之间,以利用台独分子而达到抑制或破坏中国和平崛起的总趋势。他们甚至还想重温重返台湾的美梦。^①日本朝野合作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正如过去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前日本政府之利用日本浪人所组织的玄洋社、黑龙会等民间社团,完全一样,而日本当前的新军国主义者虽然表面上尚无这样旗帜鲜明的“浪人”组织,但鉴于日本人传统上一向善于虚伪钻营于秘密性或半公开性的欺饰活动^②,当前之日本台湾学会、亚洲展望研讨会或日台美研讨会之类以学术研究为号召的一些民间与半官方学术性组织的活动,实值得关心东亚大局者的特别注视与警惕。

—

我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之初,日本社会即急剧右倾化。民族主义抬头的表现为,一方面对日美原来的“安保同盟体系”表示不满,极端的新军国主义者如石原慎太郎不只狂妄地一再重复其“南京大屠杀为虚构”的谬说,甚至还有“南京大屠杀为美国一手导

① 毛铸伦:《日本企图恢复对台湾的宗主权》,见《海峡评论》(台北)第94期(1998年10月1日),第11—12页;李恩涵:《注视日本新军国主义者对台湾的阴谋》,见《海峡评论》第125期(2001年5月1日),第29—30页。

② 参阅Chalmers Johnson, *Japan, Who Governs, the Role of Development State*(N. Y.: Norton & Co., 1995), pp. 10, 100—101.

演之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的荒谬说法；他甚至还声言要对二战后同盟国审判日本 A 级最高战犯的各国法官（实际他是针对当年美占领日本当局）“追究责任”，其措辞之尖刻无理，简直如 30 年代之日本军阀政客无异。^① 另一方面日本朝野则借口所谓“中国威胁论”（此说为日本人所首创与杜撰），使中日关系进入了摩擦与协调、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时代。1991 年，日本的泡沫经济危机开始爆发（传闻这是美国对日本意图建立独特型经济霸权的报复）。^② 1993 年 3 月，非自民党人细川护熙（他是日本当年侵华特级战犯近卫文 的外孙）当选为日本首相，虽然名义上结束了战后近 48 年日本自民党（与其前身）垄断日本政权之局，但实际上这只是日本政治中的保守主义势力借机将美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予以转化之举。日本新军国主义者在细川护熙公开向美国朝野之强大政治经济压力屈膝、并公开承认太平洋战争为“侵略战争错误的战争”的宣告后，即掀起了军国主义式反细川的浪潮。^③ 而在细川上述宣示之后的第二天，即有以众议员板垣正（他是侵华 A 级战犯板垣征四郎的次子）为事务长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宣告成立，并聘邀十多年来一直肆意否认南京大屠杀、散播仇华反华思想的田中正明（战时他任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大将的秘书）等为讲师。该历史研究委员集体撰写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则肆意扭曲过去日本对外侵略的史实，也为过去之对华侵略“涂脂抹粉”。此外，

① 李恩涵，前书，第 254 页，引《文艺春秋》，1991 年 2 月号。

② 王友仁：《美国总统大选后的亚太形势：未来亚太和平秩序的问题与展望》，见《战后东北亚国际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年 3 月），第 6 页；崔世广：《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现状与课题》，见《日本研究》（北京），2000 年第 4 期，第 72 页。

③ 王少普：《冷战后日本右翼对侵略历史的否认及其原因》，见《日本研究》（北京），2000 年第 2 期，第 70 页；崔世广，前文，第 72 页。

212 位自民党国会议员则通过了“不战决议”，宣称不能忘记过去为自存自卫和为亚洲和平而战死的 200 多万战死者。^① 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则出版《教科书没有教过的历史》一书，反对战后已经为国际社会所肯定的东京审判日本 A 级战犯诸定讞，宣称“日本人不应该说自己的坏话”。又说：日本在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找到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端绪”^②；其意似乎是说，日本要想再次复起称霸东亚，应该再度自进侵中国开始。

纪念二战结束 50 周年的 1995 年，应该是一个在国家政策上与社会思想上清理和总结日本战时历史教训的重要日子，但日本朝野之主流社会并未这样做，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否认侵略和美化战争。在 1993—1995 年的 3 年间，否认日本过去侵略和美化战争的事件，较之过去 20 年还多。内阁大臣级官员接续跳出来为历史翻案。当社会党提议以国会通过“不战决战”的形式承认侵略和向当年被侵略的亚洲国家谢罪时，竟遭到 70% 的自民党议员的反对。12 个县议会通过了向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的死亡者表示慰谢的决议；450 万人签名反对社会党的“不战决议”。^③ 所以，在 1995 年 8 月 15 日二战结束 50 周年之日日本国会所通过的“不战决议”，完全不愿正视历史史实、不作真诚反省的“决议”，只是在玩文字游戏，完全没有写进侵略、殖民统治、反省、谢罪、不战等字词，完全与社会党所提议的用意不符。^④ 很明显，1995 年的日本主流社会与 30 年代希特勒纳粹德国在不反悔战争之一点上，有其相同之

① 薛君度、陈忠伟主编：《颠簸的日本》，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2 页。

② 同书，第 183 页。

③ 薛君度、陈忠伟主编：《颠簸的日本》，第 182、177 页。

④ 冯昭奎：《对话：北京和东京》，第 71 页；王少普，前文，第 71 页。

处。这很引起中国与美国有识之士的特殊警惕。^①

二

但日本外交的狡猾之处, 尤在于它在与美国之经济政治冲突激烈、两国麻烦多多的同盟关系上, 突然在 1995 年年底左右作了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 将“消极对美”改为“积极对美”, 同时并主动联合美国, 以在美国的核子伞保护下, 转而对付中国, 并且明显地以台湾为日美联合的切入口。当时因为 1995—1996 年发生台海危机, “台皮日骨”的李登辉正逐步实行其台独计划, 引起中国大陆于 1996 年 3 月向台湾发射演习飞弹, 从而引起美国派遣航空母舰两艘巡弋台海, 予以警戒。日、美则在 1996 年 4 月的两国首脑中宣布了《联合安全保障宣言》, 随即于次年(1997)9 月 23 日签订了“日美防务新指针”(即所谓“新指针”, 以区别于两国于 1978 年所签订的旧“指针”), 规定一旦美军在远东“日本周边有事”时, 日本即在军事基地、民用机场与港口、后勤补给、运输、维修、医疗、警备、通信等方面配合与支援美军; 实际上也就是参与作战。而且, 1999 年 4 月 27 日与 5 月 24 日日本众、参两院也分别通过了《新指针》的配套法案, 包括二法和一个协定, 即《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部分修订》与《日美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修订协定》, 以落实日

① 李恩涵:《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328—331 页, 334—338 页; Yui Daizabara, “Between Pearl Harbor and Hiroshima/ Nagasaki: Nationalism and Memory in Japan and the U. S. ”, in Laura Hein & Mark Selden eds. *Op. cit.*, pp. 59—71; Sadao Asada, “The Mushroom Cloud and the National Psyche”, in Laura Hein & Mark Selden, eds. *Op. at.*, pp. 173—174, 178—187.

美军事合作“新指针”的法律基础。^①

据报道,当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与美国谈判“新指针”时,曾建议将台湾与中国南海均列入日美合作项目,并称台湾为日本南进的第一岛屿,中国南海则为日本长期性拟予占领的目标。^②桥本在“新指针”签订前向自民党干部的谈话会中,曾说:“日本周边”不仅仅局限于朝鲜半岛,它既包括南沙群岛,也包括台湾。“新指针”签订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山静六则公开声言,“新指针”所施用的“日本周边”的范围,包括台海。^③日本外务省北美局长高野纪元在国会中解释,“周边”不超过远东及远东周边地区。“新指针”肯定是针对台湾海峡有事而制订的。^④日首相助理冈本行夫在一次演讲中说,一旦台海有事,日本将是冲突的准当事国。他又曾经说,“台湾海峡就在日本附近”,“台湾海峡的安全是日美安全条约的对象”……一旦那边发生纠纷,美国肯定站在台湾一边。作为缔结了安全条约的盟国,日本要“配合美国行动”,“要最大限度地支援美国”。^⑤日本防卫所政务次官西村真悟(此人为死硬的极右派,曾于1997年5月登上钓鱼台岛,向中国挑衅)更发出狂言:“如果周边国家(明显地是指中国)将中程飞弹瞄准日本的大都市,那我们的国家就应该讨论对策。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政治家毕生的工作,就是创立国家军队……如果不是民族主义者就不具有政治

① Peter Drysdale & Dong Dong Zhang, eds. *Japan and China: Rivalry of Cooperation* (Canberra: Australia- Japan Research Center, 2000), pp. 120, 121; 宁海,《野心与密谋》,第268页。

② Ibid.

③ Qingxin Ken Wang, “Taiwan in Japan’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U. S. after the Cold War,” *Pacific Affairs*(Canada), vol. 73, No. 3(Fall 2000), p. 368.

④ 宁海:《野心与密谋》,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版,第246页。

⑤ 宁海:《野心与密谋》,第249—268页,薛君度、陈忠伟主编,《颠簸的日本》,第180—181页。

家的资格。”^① 1999 年,日本政治要人、原自民党干事长、现任国会周边事态委员会委员长山崎拓甚至公然发表“中日再战”的言论。他说:“(日美)新指针中的‘周边事态’,是十分明确的地理概念,即涵盖中国的台湾。假如中国打台独,那将威胁到日本的安全,日本就要以此为理由,派兵干涉台湾问题,与中国交战,‘征服’中国,把台湾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② 山崎拓这个狂妄无知的新军国主义者大约完全忘记了 54 年前美国的两颗原子弹一举消灭了大半个广岛与长崎的旧事;他也完全未想到当代新型核弹更可以迅速一举消灭日本大半个京滨地区与阪神地区的,TMD 实在救不了主动侵略成性的新日本。

很明显地,日本是想利用美日同盟的“新指针”向“周边地区”的海外用兵,其出兵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台湾。日本之意图挑拨挑动起台海的中美大战,其用意非常明确。日本则在配合美国的名义下让日本三军(名义上称为自卫队)重占台湾——日本要美国人打仗冲锋向前,它则在后面拣拾战争的果实。^③ 这也是为什么当日本众议院于 1999 年 4 月 27 日通过“新指针”的“周边三法案”后的 73 天之后(即 1999 年 7 月 9 日)，“台皮日骨”一心想为日本新军国主义效劳的李登辉,即在日本朝野大右派的明显鼓动下(同年 5 月著名右派文化人李某的好友中岛岭雄访台;12 月,李某另一好友石原慎太郎也访台),匆匆忙忙地宣布了他的“两国论”。这是日本朝野内外相互配合的“新型南进九一八”的开端,李登辉则为日

① 宁海,前引书,第 307 页。

② 同上书,第 10、431 页。

③ Reter Drysdale & Dong Dong Zhang, eds. op cit., p. 133, 记日本在与美谈判“新指针”时,狡猾地规避其在日美根据“新指针”之规定实行,国际制裁的海上检查时,动用日海军,坚持该制裁须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始可。实际日本是要美国先与对方(中国)冲突,它则躲避在后,以不负战争爆发之第一弹的责任。

本扮演火中取栗的角色。

但美国难道是一个“超强大傻瓜”，美国难道会为新军国主义的日本所摆布而为其操纵利用？中国领导人也不会轻易地落入日本人的圈套吧！美国与日本签订“新指针”的目的，只是想制衡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坚持“一中”之下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不支持台独）并且箝制住日本于同盟义务的网络之中（监视日本之“核子三不”政策），并非真正要与中国为了台湾而做军事的对抗的（美国当然也绝无理由为台独与李登辉流血）。所以，美国对于李登辉的“两国论”，不只公开予以抨击（违反“一中”原则），骂李某为“麻烦制造者”；更迅速派遣美台协会的卜睿哲（Richard Bush）来台痛骂了李某一顿，迫使李某将原定继之而来修宪与总统延任的预定次一步骤，为之紧急叫停。^①美国哈佛大学著名中日问题权威之傅高义教授（Ezra Uagel）则公开痛斥日本发动“新型南进九一八”的极右派新军国主义者说：他说这些人要打仗，寻求点火，想趁火打劫，破坏西太平洋的军事平衡与稳定，以求日本之东山再起，先跟在美国之后，直到有朝一日向美国挑战西太平洋的霸主地位。傅高义并明白痛骂这些日本朝野明目张胆、野心勃勃的新军国主义者说：美方是不希望打仗，而在那伙日本右派分子的心中，则是按捺不住地急切希望打仗，打大仗，甚至不惜把日本列岛“一篮子鸡蛋”的家当都赔上去，以便从中渔利，以日本为了美国的利益为名而发动中日之战，借以挣脱战后 54 年来美国对日本的军事监控，改变日本军事不独立的命运。^②

① 参阅李恩涵：《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十周年：兼论当前东亚国际大局与其前景》，见《海峡评论》，第 129 期（2001 年 9 月 1 日），第 32—33 页。

② 宁海：《野心与密谋》，第 434 页；另参阅李恩涵，《注视日本新军国主义者对台湾的阴谋》，见《海峡评论》，第 125 期（2001 年 5 月），第 31 页。

傅高义的这番话,完全戳穿了日本朝野极右派分子勾结李登辉所设计发动的“新型南进九一八”之阴谋的基本性质。

三

与日本朝野之积极推动“新型南进九一八”阴谋的同时,1993—1999 年间,日本则主动对中国挑衅,中日之间大大小小的摩擦不断,其具体实例如:

1. 1993 年日本政府公开对“中国军事威胁”表示担心。
2. 日本政府自 1994 年起缩减对华日元贷款的期限。
3. 以中国进行核试为名,冻结对华无偿援助(但这些日本公私贷华款项据说是 1978 年邓小平访问日本时日本答应的“非正式”对华战争赔款,岂能背信予以缩减或冻结)。
4. 对中国于 1995—1996 年因台湾李登辉之趋向台独,而对台作导弹试射,向中国提出抗议。
5. 甚至在 1997 年 2 月日本公然向中国打“台湾牌”,由众、参两院议员组织超党派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有成员 300 人,占国会议员总人数的 40%,加强与台湾交流,并公然声称与台湾有共同利益。^①
6. 日台关系则逐渐自民间形式转而为半官方或官方,如 1995 年以日本皇室亲王六条有康为总裁的日本文化振兴会,即拟与台湾以李登辉为会长的中华文化复兴总会建立交流关系;至 1997 年之半年内,日政府则 5 次遣派大使级官员访台。日本亲台政治人物中大多数具有较浓厚的右翼色彩,骨干成员中不乏死不悔改的仇华分子与原战犯的后

① 薛君度、陈忠伟主编:《颠簸的日本》,第 177,178—180 页。

代,如日华议员关系恳谈会会长山中贞则、副会长山泽辰男、村山正邦,骨干分子奥野诚亮、永野茂门等都是其代表人物。日本国会内的其他右翼组织如自民党的“大家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光明日本国会议员联盟”、新进党的“靖国神社参拜议员联盟”、“正确传授历史国会议员联盟”等组织的头面人物,均为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的主要成员。他们经常往返于东京、台北之间,与李登辉高层保持着密切关系。^①

7. 1997年,日本并拟设立包括台湾、琉球在内的“蓬莱经济圈自由贸易区”,以积极呼应李登辉原始提议的“中琉经济圈”,台湾计划在琉球地区投资10亿美元,其中2亿元系于最接近台湾的石垣岛上设立工厂,并以产品返销日本。^②
8. 日本舆论与学术界的右翼分子也明显地受到“台皮日骨”李登辉的游说,开始涉足于台湾问题:如1995年一些日本著名大学的校长纷纷访台。颇有影响力的国际问题专家高坂正尧也访问台北,参加了台日共同举办的研讨会。他在会中说:“离开台湾要建立地区安全体制是不现实的,其作用将明显减弱”。德山大学校长浅野一郎于1997年6月28日在东京舆论综合研究所所举办的“构筑新日台交流研讨会”中,甚至提议日本应制订“日台关系法”,“给日台实务关系以法律的基础。”^③

① 薛君度、陈忠伟主编:《颠簸的日本》,第179页。

② 薛君度、陈忠伟主编:《颠簸的日本》,第180页。

③ 薛君度、陈忠伟主编:《颠簸的日本》,第179页。

四

日本新军国主义者在李登辉于 1999 年 7 月宣布“两国论”之幕后过程中,到底扮演着如何的积极角色?至今尚无人完全了解其真相;但种种迹象都显示新军国主义者中岛岭雄于 1999 年 5 月之访台与著名右翼分子、反中华民族的急先锋石原慎太郎于同年 12 月之访台,一定曾经为日本政府核心人士与李登辉传递信息并提供某些积极性咨询与顾问作用的。石原为著名反华、仇美之激进式的新军国主义分子,在政治与社会宣传上他一向是一个颇能骇世媚俗的政客,故能一举当选东京市知事(市长)。他实在是中华民族的“准敌人”,不只曾经妄言否认南京大屠杀,说过“南京大屠杀为美国一手所导演之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之谬说,更一直到近年仍称中国为“支那”、称中国人为“支那人”,与战前之日本军阀无异。他也在与人合著之《日本可以说不》、《日本还要说不》与《日本坚决说不》等三书及在美国《花花公子》(Playboy, Oct. 1991)中,痛骂美国之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声言二战后同盟国之审判日本战犯为“无权威性与正当性”,又曾痛攻美国之控制日本之卫星通讯与国防生产,声言日本应不再听从美国的支配,甚至要追究美国以原子弹轰炸日本的旧帐等等。所以,石原实在是一个怙恶不悛,不折不扣的新军国主义者与复仇主义者。^①这样一个反华仇美的妄人于李登辉之“两国论”宣布后之 5 个月内来访李某,其所谈所论的内容重点,可想而知。有人因此揣测石原之来台访问,可能是为了专程告知李登辉有关日本核子化与导弹防御系统(TMD)的一些发展现况,以及运用 TMD 以保护南韩与台湾的可能发展等事,

① 李恩涵:《日本军战争暴行之研究》,第 254—255 页。

以为李某减惊壮胆。^①

第二个新军国主义者、对台湾怀有极大的阴谋、出面为日本政府出面奔走的“小人物”，是东京外国语大学校长中岛岭雄（他除在该校的前身国际教养大学毕业外，也曾在东京大学获有社会学博士），他是经常往来东京、台北为李登辉出谋划策、联系日本朝野人士之人。他曾任日本外务省在香港的“特别研究员”（与情报有关的“特务”？），著有或合著、编著有《来自中国之威胁——日中友好之幻想》（2000年）等书34册。^②1989年，中岛曾经在李登辉的官邸中与李某共同观看西方记者所摄制的“天安门事件”的电视影片，可见他与李某之间关系深厚的程度。^③中岛为反华的急先锋，为中华民族凶险恶劣的“敌人”，曾在日本著名政论性杂志《中央公论》中撰文，认为中国应分为11国，即西藏、蒙古、新疆、满洲、台湾、港澳、华东、华南、华西、华北、华中等；中国领土最适合的疆域，即当如法国一样，台湾则当独立。由于他与李登辉臭味相投，故受到李某的推崇，经常邀请他主办或主持“亚洲展望研讨会”，隔年分在台北或东京举行。^④1994年12月，台湾举行地方县市长选举，竞选高雄市长的国民党候选人吴敦义声言要率领一批爱国青年乘船登陆钓鱼台岛，以宣示中国主权，中岛岭雄乃打电话给李登辉，由李出面予以阻止，致吴未能果行。^⑤

1999年5月（即在日本众议院通过“周边三法案”之后不到一个月之内与李登辉宣布“两国论”之前约二个月），中岛岭雄在台北的一项研讨会中，大放厥词，极力主张台湾、美国、日本联合成一条

① 李恩涵：《石原慎太郎所为何来》，见《海峡评论》，1999年12月，第48页。

② 参阅 <http://ja.wikipedia.org/wk%7>。

③ 许介麟：《台湾史记（续），卷四》，台北文英堂出版社2001版，第71页。

④ 冯沪祥：《李总统叛国心迹》，台北国是评论杂志1996年版，第72页。

⑤ 许介麟，前引书，第163页。

防线,以阻止中国的扩张。当时日本国会既然已通过了“周边三法案”,他的这番说词无异透露了他在敦促李登辉应迅速参与美日之间的新联合,也无异在唆使美国与中国之全面对抗,以为日本重返台湾并重新崛起于东亚的霸权铺路。因此,引起台北学术界洞察中日大局者出而对他痛骂之,并严重警告之,如“日本右派之想重新参与韩国与台湾的军事事务,如中岛之所云,日本当极有可能重蹈 1930 年代德国第二度趋向大覆亡的覆辙”。^①

此外,许多研究台湾问题的日本学者虽然不一定是新军国主义者,但经常有意识与无意识地支持台独或与李登辉有着千丝万缕的不同层次的关系,因而无法维持学术研究之判断中立与追求真实的基本立场。如历史学者曾任日本驻泰国大使的冈崎久彦,著有《冈崎久彦特集》,其书中在论及台湾时,即认为“台湾作为中华化外之地,有其固有的民族主义,而这个民族主义毋宁是与独立意向相结合的”;又说:“台湾系与大陆中心文化相隔绝的岛国……与美国有相似的环境”,亦即鼓励台湾独立于中国之外,如同美国独立于英国之外一样。因此,冈崎久彦受到李登辉的激赏,不只于 1995 年 10 月将其上述《特集》一书列为台湾青少年百杰的课外必读物,还邀请他到其台湾政府机关作专题演讲,令有关的全体职员都来听讲(冈崎也曾大力鼓吹日本战后的民族主义,曾于 1992 年撰文宣称:“日本再过十年,将成为世界超级强国……至少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可能处于类似大英帝国鼎盛时期那样的地位。”但他的预言并未实现,反而 1991 年后日本泡沫经济的危机,连其“经济超强”的地位,至今也一落千丈了)。^②

1998 年 5 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日本台湾学会,系以对台湾进

① 李海汉:《中岛岭雄的谬说可以休矣》,见《海峡评论》,1999 年 7 月,第 20 页。

② 冯沪祥,前引书影印件(无页次);宁海:《野心与密谋》,第 322 页。

行学术研究与交流为目的,标榜不涉及当前政治,发起者除东京大学教授若林正夫、藤井省三、关西大学教授石田浩、大桥英夫等 31 人外,创会会员有 145 人(现在会员增至 300 多人),多数是执教于日本各公私立大学的日本学者,多位台湾学者如台湾大学副教授吴密察、台湾艺术学院(大学)教授陈其南等也受邀参加。该学会于成立之初,即选出若林正夫为第一位会长,在成立主旨中指出,从地理上、民族上及历史上来看,台湾在学术领域上已具备适合于成为“区域研究”的性格,不宜再定位于中国研究的下层领域,显示已具有一定的独有性。因此,该学会的成立虽说是将与“中国研究”相辅相成,但多少有些倾向于台独的敏感性。^①

在若林正夫的主持下,日本台湾学会所进行的学术研究,相当顺利而良好,除于 1999 年 5 月即出版了《日本台湾学会报》创刊号之外(现已出版至第 5 号,每年 1 册),也发行了定期出版的《日本台湾学会ニエースレター》(《学会通讯》)(约 5 个月至 10 个月一期);并致力编纂《战后日本台湾研究文献目标》(由北海道大学助员授川岛真主持),建立电脑连线沟通,也经常定期在日本与台湾举办小型的研究会、演讲会、读书会等。^②若林正夫毕业于东京大学,1972 年获硕士(修士)学位,1985 年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其代表性著作有《台湾抗日运动史研究》(研文出版 1983 版,为若林的博士论文)、《蒋经国与李登辉》(岩波书店 1997 版)等,所下功力甚深,而且也相当忠实客观。^③例如他在《蒋经国与李登辉》一书中,即认为“现在的李登辉愈来愈像日本的天皇,变成是不会犯错的

① 《联合报》(台北),1998 年 5 月 31 日;《中国时报》(台北),1998 年 4 月 6 日。

② 参阅 <http://www.soc.nii.ac.jp/jats/gakkaiho/gakkaiho.htm>。

③ 同上注。

人。出了任何事情,都是这个人、那个人的错,反而不会是他的错”。^①

惟日本台湾学会会员的来源与会员研究的范围,也相当庞杂,该学会虽说是与当前政治无关,但它的核心会员中不只有着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的松田康博(他研究中台美之间的军事关系与台湾情治单位的历史与现状诸问题——他的中文造诣极佳,并且显然可能与日本在台的情治体系有关);该学会的一些学术研究会也有日本官方驻台湾机构的交流协会的“日台交流センター(日台交流中心)的人员参加,有着相当地学术与政治不分的情况。^②1998年3月19日至21日,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与美国 gowa 州立大学人类系合办“中国文化面貌新探国际研讨会”,日本台湾学会创会会员沼崎一郎(东北大学教授)在会中宣读论文,题目为“The ‘Real Community’ Under “Gmagedn” States: The Soci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Taiwan Consciousness’ in Contemporary Taiwan(《“想像中国”之“真实社区”:当代台湾的社会经济变革与其“新台湾意识”的兴起》),文中除分节讨论“真实社会的构造”、“真实社区的正面实现与‘新台湾意识’的兴起”,与“从‘现象中国’到现实的政治社会:‘新台湾意识’的政治意识”等问题之外,他在上述最后一节中说,“新台湾意识”就是要将“想像中国”量身制造为合乎未来台湾岛上独立的“真正社会”的——他实际在公然挑拨与鼓吹台独。^③这是有违他的学者身份的。当为参加该研讨会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恩涵所驳斥,认为他之认定未来台独的必然趋势是毫

① 冯沪祥,前引书,第86页。

② 参阅 <http://www.soc.nii.ac.jp/jats/gakkaiho/gakkaiho.htm>。

③ 见《中国文化面貌新探国际研讨会》沼崎一郎的论文(英文)。

无道理的,因为“新台湾意识”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有着各项不同的可能趋向,并非如他所论的具有“必然性”。李氏并提醒他,他是一位日本籍学者,在台北以外国籍学者身份而谈论台湾政治上的敏感问题,实已违犯了国际法中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了。李氏并在正式发言之后,向沼崎一郎递出一张用英文写成的“字条”：“我可不可以日本北海道札幌(的学术讨论会上)公开主张(北海道)爱奴民族独立运动?中国也可以强力支持琉球独立运动。”^①这就是对沼崎一郎非学术性武断式的讨论的一项纠正。

不过,从我们现所见到的日本台湾学会在日本与台湾所公开的各项年会、研究会与演讲会的资料看来,至目前为止,该学会在若林正夫与第二位会长石田浩的领导下,尚能谨守学术研究的分际的。^②总之,台湾是中国人的台湾,他国人包括日本的学者当然可以对其作种种客观性的研究,但如果将特定的政治意识与学术研究纠缠在一起,却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我们当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

(作者李恩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兵)

① 见李恩涵就上述沼崎一郎之论文的札记。

② 参阅 http://www.soc.ni.ac.jp/jats/news_letters 与其他相关文件。